

# 满一通古斯诸语

比 ■ 较 ■ 研 ■ 究

D·O·朝克 著

民族出版社

(1994—1996年)

国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  
青年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 满—通古斯诸语

比 ■ 较 ■ 研 ■ 究

D·O·朝克 著

民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朝克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9

ISBN 7-105-02883-1

I. 满… II. 朝… III. 少数民族-民族语-比较研究-中国 IV. H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561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北京金甬民族科贸公司微机照排 民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字数:290 千字

印数:0001-900 册 定价:19.00 元

# 目 录

绪论	(1)
<b>第一章 语音结构比较</b>	<b>(14)</b>
第一节 短元音系统	(14)
第二节 长元音系统	(17)
第三节 复合元音系统	(20)
第四节 单辅音系统	(24)
第五节 复合辅音系统	(33)
第六节 叠辅音系统	(37)
第七节 音变规则	(41)
第八节 音节	(47)
(一)音节构成形式	(47)
(二)音节划分方法	(51)
(三)音节与词的关系	(53)
第九节 重音	(55)
第十节 元音和谐规律	(55)
<b>第二章 语音对应规则</b>	<b>(61)</b>
第一节 元音对应规则	(61)
(一)短元音 i 的对应	(62)
(二)短元音 ə 的对应	(73)
(三)短元音 a 的对应	(86)
(四)短元音 o 的对应	(102)
(五)短元音 u 的对应	(109)

DY69/06

第二节 辅音对应规则	(122)
(一)舌尖音的对应	(122)
(二)舌面音的对应	(153)
(三)双唇音的对应	(178)
(四)舌叶音的对应	(191)
(五)唇齿音的对应	(200)
<b>第三章 形态结构比较</b>	<b>(205)</b>
第一节 数形态结构	(205)
第二节 格形态结构	(210)
第三节 人称领属形态结构	(234)
第四节 形容词的级形态结构	(242)
第五节 动词的态形态结构	(259)
第六节 动词的体形态结构	(270)
第七节 动词的式形态结构	(287)
第八节 副动词	(319)
第九节 形动词	(339)
第十节 助动词	(344)
<b>附录：满一通古斯诸语元音表</b>	<b>(356)</b>
满一通古斯诸语辅音表	(357)
中国满一通古斯诸语分布图	(358)
世界满一通古斯诸语分布图	(359)
女真文字例表	(360)
满文字母表	(361)
锡伯文字母表	(362)
埃文基语、埃文语、那乃语文字	(363)
<b>参考书目</b>	<b>(364)</b>
<b>后记</b>	<b>(368)</b>

## 绪 论

满一通古斯诸语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主要由蒙古语族诸语言、突厥语族诸语言、满一通古斯语族诸语言构成。这三大语族中的诸语言无论在语音结构,还是在形态结构以及语法程序方面都有着相当多的共性。譬如说,在元音和谐、音变规则、元音和辅音的总体构成、派生新词的黏着性构词体系以及用黏着性后缀表示错综复杂的形态变化等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满一通古斯诸语在我国境内有历史上的女真语以及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等。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的黑河市、逊克县、塔河县、富裕县、泰来县、讷河市、嘉荫县、同江市、饶河县和内蒙古自治区的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陈巴尔虎旗、阿荣旗、额尔古纳市、扎兰屯市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巩留县、塔城市、伊宁市等地。在国外属于满一通古斯诸语的语言有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埃文基自治专区、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萨哈林州、堪察加州、马加丹州等地的埃文基语、埃文语(也称拉穆特语)、涅基达尔语、那乃语(也称戈尔德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德盖语、奥罗奇语等。在蒙古国巴尔虎地区也有一部分被称为察嘎坦人的鄂温克族;在日本北海道网走地区也有一些被称为乌依勒塔的奥罗克人。满一通古斯诸语的这些语言根据其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具有的不同程度的共性,分为满语支语言和通古斯语支语言。满语支语言里包括女真语、满语、锡伯语;通古斯语支的语言还分为南通古斯分语支和北通古斯分语支。北通古斯分语支语言里包括鄂温克

语、鄂伦春语、埃文基语、埃文语、涅基达尔语、察嘎坦语(属于鄂温克语分支);南通古斯分语支语言里包括赫哲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乌德盖语、奥罗奇语、乌依勒塔语(属于奥罗克语分支)。满一通古斯诸语除了与蒙古语族诸语言、突厥语族诸语言有密切关系外,还与日本的阿夷努语、日语、朝鲜语、美国和加拿大等地爱斯基摩人的语言、印第安人的语言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国的满一通古斯诸语内女真语、满语、锡伯语有文字或曾有过文字。女真文是金代女真人创制的文字。有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两种。女真大字是金太祖阿骨打命完颜希尹等以汉字楷书为基础,参照契丹文的创制方法而创制的,于金天辅三年(公元1119年)颁行。女真小字是金熙宗创制并颁行于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女真文最初是属于表意文字,后来依据女真语的形态变化,文字被分为词干字和词缀字,最后演变成金熙宗创制的表音字。当时,女真文字作为官方性文字使用,到12世纪后期有了用女真文字译写的汉文经书。公元1234年金朝灭亡后,女真文字逐渐失传,用女真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留传后世的也不多,只有在《华夷译语》中的《女真馆来文》、《女真馆杂字》及石刻、符牌、印章、器物铭文等文物中留下为数不多的女真文字。满文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仿照蒙古回鹘文于1599年创制的。由于初创的十二字头满文标音不太精确,因此在使用过程中逐步加圈加点,以此区别发音不同而形体相同的字母。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命达海将无圈点老满文增改成为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及10个专写外来语字母的、有圈点新满文。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曾仿照汉文篆字创制过按笔画特征命名的、有32种字体的满文篆字。满文在清代曾作为国书与汉文并用。当时,满文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文字,被纳入到学校教育课程里,并用满文撰写和翻译了数量浩繁的有关历史、宗教、社会、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书籍。其中,关于语言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大清

全书》(沈启亮,1683年)、《同文广汇全书》(阿敦等,1693年)、《满汉同文全书》(1700年)、《满汉类书全集》(桑额,1702年)、《清文汇书》(李延基,1724年)、《清文启蒙》(舞格,1730年)、《清文典要》(秋芳堂,1738年)、《无圈点字书》(鄂尔奉等,1741年)、《三合便览》(敬斋等,1760年)、《清语易知》(博赫,1764年)、《御制五体清文鉴》(1795年)、《清汉文海》(瓜尔佳氏巴尼琿等,1821年)、《清文虚字指南编》(万福,1885年)、《清文总汇》(志宽等,1897年)等。从汉文翻译成满文的著作中主要有《论语》、《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文和满语的使用率也逐年下降,到最后只有一小部分满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其他都转用汉语和汉文了,但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锡伯文是于1947年在满文基础上稍加改制而成的。其书写方法与满文相同,行款从上到下,从左到右。锡伯文字母有6个元音字母、24个辅音字母、10个专写外来语的字母等40个字母。锡伯文一直是作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锡伯族小学生的必修课之一。该县内还办有锡伯文报纸《察布查尔报》及锡伯文刊物《锡伯语言通讯》、《锡伯族文艺》。新疆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设立锡伯文编辑组以后陆续用锡伯文出版了《锡伯(满)语词典》(佟玉泉等,1987年)、《汉锡简明对照词典》(1989年)、《锡伯语词汇》(郭秀昌,1991年)等以及《旧清语辞典》(新疆古籍办,1987年)、《满文教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1年)、《新满汉大辞典》(胡增益等,1994年)等相当有学术价值的满文、锡伯文方面的辞书和教科书。在此之前也有过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汉文名著的锡伯文传抄本或翻译本。另外,俄罗斯境内的埃文基语、埃文语、那乃语、乌德盖语在20世纪20年代末用拉丁字母创制过各自的文字。但埃文基文、埃文文、那乃文、乌德盖文都未能产生多大社会影响,试行不久几乎就自然停止使用了。不过,也有一些用这些文字撰写的辞书、教科书及研究著作等。总



之,现行的满一通古斯诸语的文字只有锡伯文。为了更好地整理、编译和研究库存的满文资料,从50年代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地方有关院所等先后办过多期满文短训班、函授班,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满文研究人员和工作者,满文也一直作为满文专业人员的必修课,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教授课程被使用。同时,近年来还成立了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内蒙古大学满一通古斯语研究室、辽宁省档案馆满文组、中央民族大学满学所、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满文室、黑龙江省满一通古斯语研究会、新疆锡伯族研究会锡伯语研究分会、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研究会鄂温克语研究组、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研究会鄂伦春语研究组等研究机构及社团组织,并在中央民族学院、黑龙江省党校、内蒙古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等地开设过满文专业班或有关满一通古斯诸语方面的专业课程,从而,培养出了一些满一通古斯诸语研究专家学者。

满一通古斯诸语内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他们的祖先最早接触的是满文和俄文。在清代他们中贵族阶层的子弟都学了满文和俄文。后来一部分人学了汉文、日文,到了民国后期学汉文和蒙古文的人就逐渐多起来了,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孩童根据各自的需要上汉文学校或蒙古文学校,通过汉文和蒙古文学习文化知识的现象已经普遍了。

满一通古斯诸语中被同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女真语早已成为历史而失传。满语也像我们在前面谈到的那样,除了一小部分满族人使用以外,几乎没有人使用了。赫哲语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有50岁以上的赫哲人懂本民族语或有时用本民族语交际,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是说汉语,50岁以下的赫哲人基本上都使用汉文、汉语。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的使用人口也在急剧下降,可以说,在青

少年中使用本民族语的越来越少,尤其学龄前儿童懂本民族语的更少;不过,在中老年人中使用本民族语者仍占大多数。鄂伦春人除了使用本民族语外,都兼通汉语。鄂温克人除了使用本民族语外,都不同程度地掌握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等。鄂伦春族适龄儿童都读汉文,鄂温克族适龄儿童中读蒙古文的多而读汉文的少。锡伯族里除了新疆地区的居民之外,几乎都不使用锡伯语,而是使用汉语了,他们的适龄儿童也都上汉文学校读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内由于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文字,因此,本民族语的使用率要高一些,甚至孩童也会说一口流利的本民族语。另外,锡伯人还兼通汉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达斡尔语等。尽管如此,锡伯语的使用人口每年仍在减少。总之,满一通古斯诸语被同化现象一天比一天变得严重。相比之下,鄂伦春语和赫哲语比锡伯语和鄂温克语被同化程度要高一些。在国外,满一通古斯诸语也被俄语和蒙古语等同化得比较快,尤其是俄罗斯的通古斯诸语俄语化现象比较普遍。据统计现在我国境内使用满一通古斯诸语者有4.6万多人,在国外有2.5万多人,总计约有7.2万人。

满一通古斯诸语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始于15世纪末期,当时出版了《大清全书》、《同文广汇全书》等,后来又出版了一些有关满语构形和构词成分以及后置词、连词、副词等方面的研究性书籍,如,《清文接字》、《清文虚字指南编》、《字法举一歌》、《清文启蒙》等。女真文的研究是从19世纪初期开始的,当时就有刘师陆的《女真字碑考》、《女真字碑续考》;20世纪60年代金光平和金启琮的权威性著作《女真语言文学研究》油印本问世;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出版,书中用一定篇幅描述了赫哲语,还附有赫哲语词汇。20世纪60年代我国对满一通古斯诸语进行过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但许多研究成果是在8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其中有《女真语辞典》(金启琮,1984年)、《女真馆杂字、来文》研究》(和希格,1982年)、《女真语音初探》

(道尔吉,1982年)、《女真译语研究》(道尔吉等,1983年)、《满语语法》(乌拉熙春,1984年)、《满语语法》(季永海等,1986年)、《现代满语研究》(赵杰,1989年)、《满语语音研究》(乌拉熙春,1992年)、《满语口语研究》(恩和巴图,1995年)、《满文讲义》(北京满文书院,1994年)、《满语读本》(乌拉熙春,1985年)、《现代满语八百句》(季永海等,1989年)、《满汉大辞典》(安双成等,1993年)、《新满汉大辞典》(胡增益等,1994年)、《锡伯语简志》(李树兰等,1986年)、《锡伯语口语研究》(李树兰等,1984年)、《锡伯语词汇》(郭秀昌,1991年)、《汉锡简明对照辞典》(关善保等,1989年)、《鄂温克语研究》(朝克,1995年)、《鄂温克语简志》(胡增益等,1986年)、《鄂温克语基础词汇集》(朝克,1991年)、《鄂温克语蒙汉对照词汇》(贺兴格等,1983年)、《鄂伦春语简志》(胡增益,1986年)、《鄂伦春语汉语对照读本》(韩有峰等,1993年)、《简明汉语鄂伦春语对照读本》(萨希荣,1981年)、《赫哲语简志》(安俊,1986年)、《简明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尤志贤等,1987年)等诸多研究性著作、辞书。它们都各有优点和学术价值,并且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探讨和反映了满一通古斯诸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特征。可以说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我国对满一通古斯诸语的研究水平。同时,在这约40年的时间里还公开发表了约500篇学术论文。这些论著包含了语音学、语汇学、构词学、形态学、语法学、语义学、社会语言学、语源学、比较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地名语言学等诸多语言学内容,具备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其中,很多论著荣获国家和地方的各种科研成果奖。

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到的是国外专家学者对满一通古斯诸语研究工作所做出的成绩。国外从17世纪末就有人研究满语,在这三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们撰写出版了相当数量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著,比如:葛鲁贝《女真语言文字考》(德国,1896年)、渡边薰太郎《女真馆来文通解》及《女真语的新研究》(日本,1933—1935

年)、长田夏树《满洲语和女真语》(日本,1949年)、李基文《中世纪女真语音韵学研究》(朝鲜,1958年)、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音再构成考》(美国,1973年)、山路广明《女真文字的构造》及《女真文字加点之研究》(日本,1952—1953年)、阿米奥《满语语法》(法国,1789—1790年)、扎哈罗夫《满语语法》和《满俄大辞典》(圣彼得堡,1987—1989年)、穆麟多夫《满文文法》(上海,1892年)、高桥景保《增订满文辑韵》(日本)、长崎中文《翻译满语纂要》(日本,1848—1854年)、今西春秋《满和对译满洲实录》(1938年)和《满和蒙和对译满洲实录》(日本,1992年)、伯什阔夫《满语简单句语法》和《满语》(俄罗斯,1950—1963年)、豪尔《满德辞典》(德国,1952—1955年)、山本谦吾《满文形态论》和《满洲口语基础词汇集》(日本,1955—1959年)、神田信夫等《满文老档》(1955—1962年)和《旧满洲老档》(日本,1972—1975年)、田村实造等《五体清文鉴译解》(日本,1955年)、羽田享《满和辞典》(日本,1973年)、福田昆之《满洲语文辞典》(日本,1987年)、中岛干起《电脑处理御制增清文鉴》(1—3册,日本,1993—1995年)、波里普《索伦语材料》(俄罗斯,1931年)等。另外,马阿克《黑龙江旅游记》及《乌苏里江流域旅行记》(俄罗斯,1959—1961年)、勒雷勃全《关于赫真人语言特征的看法》(俄罗斯,1861年)等。可以看出,国外专家学者对我国境内的满—通古斯诸语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女真文字和满文档案资料及满语书面语方面,其中对词汇的研究成绩较突出。

国外专家学者,对于我国境外的满—通古斯诸语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俄罗斯境内的通古斯诸语研究取得的成绩较明显,比如:威特森《埃文基语词汇手稿》(1692年及1705年)、佩特罗娃《那乃语乌利奇语方言》(1936年)、《那乃语语法概要》(1941年)、《奥罗克语》(1946年)、《简明那乃语俄语辞典》(1935年)、什涅依捷尔《简明乌德语俄语辞典》(1936年)、瓦西列维奇《埃文基语语法纲要》(1940年)、《埃文基语俄语辞典》(1940年)、

《俄语埃文基语辞典》(1948年)、阿夫洛林的《那乃语语法》(1955—1961年)、琴其乌斯《通古斯语满语比较词典》(1975—1977年)、苏尼克《通古斯语满语动词》(1982年)、《通古斯语满语名词》(1982年)、本青《拉穆特语法》(1955年)、门格斯《通古斯语》(1968年)、池上二郎《乌依勒塔语基本词汇集》(1980年)、北川源太郎笔录《乌依勒塔语》(1—4册,1986—1991年)、洞潟久治《乌依勒塔语辞典》(1981年)等。这些论著及辞书比较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国外通古斯诸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特征,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通古斯诸语与满语之间存在的同源成分及演化现象,而且材料扎实,理论性强。除此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富有独创风格的学术论文。所有这些都为后人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纵览国内外三个多世纪以来满—通古斯诸语研究所走过的历程,的确是硕果累累,也有不少流芳百世的精品。美中不足的是,对我国境内的满—通古斯诸语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的著作几乎没有。琴其乌斯、苏尼克等虽然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讨论过满—通古斯诸语的有关内容,不过,他们研究的着重点是俄罗斯境内的通古斯诸语以及满语书面语。而谈到我国境内的通古斯诸语的形态变化等现象比较少。这不能不说是满—通古斯诸语研究领域的一大缺憾。在这一客观事实面前,我作为一名从事满—通古斯诸语的研究人员,应该自觉地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因此,在1993年4月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递交了撰写我国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之书的申请书。我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最高学术委员会的批准,被列为1994年至1996年度国家资助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的青年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并拨给了专项资金。资金到位后,从1994年初我就开始了此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三次到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居住地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收集了大量的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比较研究资料及话语材料,在此基

础上参阅和利用现已公开出版和发表的有关论著,尤其是有关锡伯语和满语方面的论著,撰写了近30万字的《满一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的书稿。

本书主要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探讨了我国境内的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的语音体系、语音对应体系以及重要的形态体系等的问题。原想在这部书里将女真语也包括进来,但由于用现有的女真语资料与满一通古斯诸语的其它语言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比较研究有一定困难,所以放弃了这一想法。我想,待女真语各方面的资料比较丰富时,将女真语跟满一通古斯诸语进行比较研究,还是有必要的。这对最终构拟原始满一通古斯诸语的语音体系及形态结构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满一通古斯诸语内的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共有短元音 a、ə、i、o、u 5 个。另外,短元音 e 在锡伯语、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出现;短元音 ɤ 和 ɛ 在鄂伦春语及鄂温克语里出现;短元音 y 与 œ 只在锡伯语和赫哲语里有;短元音 u 也只出现在满语里。长元音在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内出现得最多,在满语和赫哲语里也有一些。复合元音在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里使用得较多。辅音结构中像 b、p、m、w、d、t、n、l、r、s、g、k、ŋ、j 是在满一通古斯诸语内均能见到的;辅音 x 除了鄂温克语之外的其它四种语言里都有;辅音 dʒ、tʃ、ʃ 在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里使用;辅音 dz、tʂ、ʂ、z、dz、ts 在满语和锡伯语中出现;辅音 f 只使用于满语、锡伯语、赫哲语;辅音 ɲ 也只在鄂伦春语和赫哲语里有;辅音 ɣ 则出现于鄂温克语和锡伯语;辅音 dz、tɕ、ɕ、G、q、v 只在锡伯语里有。在锡伯语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复辅音,其次在赫哲语和鄂温克语里也有不少复辅音。在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中有一定数量的叠辅音。满一通古斯诸语的复辅音和叠辅音一般位于词中或词尾,在词首不出现;辅音 r 除借词之外不在词首出现;辅音 ŋ 只在鄂伦春语或鄂温克语个别方言内使用于词首;辅音 j 在词首出现的也

较少；辅音 b、p、m、n、ŋ、r、s、g、k、w、j、d、t 等在词尾出现的多一些。相比之下，锡伯语的语音结构要复杂得多，其次是赫哲语和满语。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的语音结构要比其它三种语言相对简单一些。满—通古斯诸语的音变规则中词尾元音的弱化现象或脱落现象、元音的鼻音化现象、元音顺同化和逆同化现象、元音间辅音 g、g 等的脱落、辅音的顺同化和逆同化现象等比较突出。满—通古斯诸语的元音和谐现象里最为严格的是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在这两个语言中不只有阳性元音、阴性元音、中性元音的和谐规则，而且几乎每个元音音素都可以独立成为一个和谐单位。满—通古斯诸语的词是以元音作为主要音节单位构成的，基本上一个词里有几个元音就有几个音节。词中绝大多数是属于两个音节以上的多音节体，甚至有七个音节、八个音节或八个音节以上构成的多音节体。音节的构成形式多为 cv、vc、cvc 三种；其次是 cvv、cvvc、vcc、v；也有 vv、cvcc、cvvv 等形式的音节结构。满—通古斯诸语的词重音主要落在词的第一音节元音上，只有满语的词重音落在词的第一音节或词尾音节的元音上面。

满—通古斯诸语的构词体系里主要有派生法和合成法，其中在词根或词干后面接缀黏着性构词后缀派生新词的办法占绝对优势。派生的新词中多数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和后置词，数词、代词、连词中虽然也有派生新词的现象，但不是很多。合成法里以并列、修饰、补充、表述、重叠等形式合成的新词较多。另外，在满—通古斯诸语内也有以语音交替法和谐音法等构成新词的现象。在构词结构方面最为复杂的是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其次是赫哲语和锡伯语。满语在这方面没有其它四种语言复杂。从满—通古斯诸语基本词汇的总体特征上来讲，有关自然界、狩猎业、畜牧业、渔猎业等方面的词十分丰富。然而从每个语言的词汇构成上看，也都有各自的特点。譬如说，满族由于接触先进民族文化最早，所以，在满语里有关社会组织、各种官职、宫廷器用、文化艺术、

科学教育方面的词汇相当发达；锡伯语里有关农耕文化方面的词汇较丰富；鄂温克语中畜牧业词汇占优势；鄂伦春语内狩猎和与此相关的词汇要多一些；赫哲语中渔猎业词汇比较多。满一通古斯诸语内也有一定数量的外来词，其中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借词较多，而最多的是汉语借词。但从每个语言的角度来分析，被借入的外来词的情况也有所不同。譬如说，满语中有汉语、蒙古语、藏语、梵语借词；锡伯语中有汉语、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借词；赫哲语中主要有汉语借词，也有一些早期俄语借词；鄂伦春语中有汉语、俄语借词和一部分蒙古语借词；鄂温克语中主要有汉语、蒙古语、达斡尔语借词，也有不少俄语、藏语借词等。在满一通古斯诸语的早期借词内汉语、蒙古语、藏语、梵语借词占优势，后期借词里出现了像哈萨克语、维吾尔语、达斡尔语等借词以及汉语和蒙古语的新词术语。满一通古斯诸语里在借词后面接缀各种构词后缀派生新词的现象也有不少。

满一通古斯诸语的词类范畴里一般都有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数词、副词、后置词、助词、连词、语气词、感叹词、拟声拟态词等。其中，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包括有关副词等一般都有数、格、领属等形态变化。但满语里没有领属形态，锡伯语也只有人称领属而没有反身领属形态。动词基本上都分态、体、时、式、人称等形态变化以及形动词、副动词、助动词等。形容词还有级形态。级形态一般分为一般级、最低级、次低级、低级、次高级、高级、最高级七种。在诸多的形态变化方面最为复杂的是鄂温克语和鄂伦春语，其次是赫哲语。满语和锡伯语的形态变化没有其它三种语言那么丰富。在那些错综复杂的形态结构里除了满语书面语内出现以分离式成分表示有关语法关系之外，包括满语口语（其实在满语书面语中也能见到）在内的满一通古斯诸语均以黏着性后缀表示各种不同的语法关系。

满一通古斯诸语内的词与词的组合形式最常见的有并列式、



支配式、修饰式、补充式、限定式、表述式、否定式、判断式八种。根据这八种不同的词组以及不同的词在句子内所发挥的不同作用或所处的不同位置,将满一通古斯诸语的句子成分分为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等,其中,主语和谓语是句子的主要成分,其顺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满一通古斯诸语内虽然每个句子都不应缺少主语和谓语,但不能排除在某些简单句中主语被省略的现象。谓语几乎是任何一种句子都不应缺少的内容。宾语、补语、定语、状语是句子的次要成分,在句子中起着修饰和连带主语和谓语这两个主要成分的作用。满一通古斯诸语的主语主要由接缀有不同形态后缀的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形动词以及有关词组充当;谓语由动词各种终止形式表示,其中,常见的是动词的陈述式、祈求式、命令式、假定式。名词、形容词、代词、数词,甚至有关副词的主格形式等也可以充当谓语。助动词和副动词充当谓语时须句末语气词的协助;宾语多数是位于谓语之前,并且一般由名词、代词、形容词、形动词、数词等领格形式充当;补语通常处在句末谓语的前面,由名词、代词、形容词、数词等的位与格、从比格、造格来充当;状语由副词、副动词构成,也有由后置词构成状语的现象。状语也常常位于句中的被修饰动词的前面;定语由名词、代词、形容词、形动词、数词等领格充当,位于被修饰或限定语的前面。满一通古斯诸语句子成分在句子中的顺序为:定语——主语——(定语)——宾语——状语(补语)——谓语。满一通古斯诸语的句子结构里也有位于句子前的独立性较强的叹词,以及位于句中的有特殊语气功能及语义价值的插入语等。从满一通古斯诸语句子的整体结构上讲,一般分为简单句和复合句。将简单句和复合句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句义结构以及句形可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求句、命令句、假定句、感叹句等。

满一通古斯诸语无论在语音结构方面,还是在词汇的构成以及形态变化方面等诸多语言学领域里均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